

21
21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丛书



我肩负的使命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

21世纪出版社



我肩负的使命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

21世纪出版社

我肩负的使命

作 者 ： 阿成（单汝洪）

责任编辑 ： 单慧敏、陈天亮

校 对 ： 颂平、阿川、方山

督 印 ： 方山

出 版 ： 21世纪出版社

PENERBITAN ABAD DUA PULUH SATU
19, JALAN 7/17, TAMAN FADARSON,
JINJANG UTARA, OFF JALAN KEPONG,
52100 W.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MALAYSIA.
H/P : 012-6101 970 / 012-2611 807
E-mail : my21cp@yahoo.com

承 印 ： BENAR PADU SDN. BHD.

7, JLN. SUNGAI RASAU 41, OFF JALAN DATO' MOHD SIDIN,
41300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E-mail: benarpadu@yahoo.com
Tel : 03-3342 5787, 3344 5415, 3342 3518

日 期 ： 2007年6月

定 价 ： RM 22.00 S\$ 14.00

ISBN ： 978-983-3164-10-3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阿成，又名阿海，原名单汝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马共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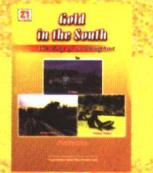
介绍革命电台 (华语光碟)

名称：密林绝唱
制作：和平村影音室
定价：RM10.00 (令吉)



马来语、华语 双语同步光碟

名称：战士走过的路
制作：和平村影音室
定价：RM12.00 (令吉)



Gold in the South

Author : Shan Ru Hong
Translator : Lim Kean Chye
Price : RM20.00
S\$12.00

从武装斗争到和平

原著：拉昔·迈丁
译者：阿凡提
定价：RM18.00 (令吉)



马泰边区风云录 (第三集)

编纂：方山
定价：RM30.00 (令吉)



从“八扩”到抗英战争

作者：阿成
定价：RM20.00 (令吉)

我肩负的使命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

目 录

一	出国的历程 -----	1
二	“青训班”找上门 -----	4
三	进住中南海 -----	11
四	参加“第一学习组” -----	15
	学习班成员及课程	15
	中共元帅、将军、建国元勋们亲自授课	19
	结 业	36
五	进“马列学院”学习，培养我党理论干部 -----	43
六	国际活动 -----	50
	之一：将马来亚工人运动展现在国际舞台	50
	之二：登上国际讲坛，争取国际声援	56
	之三：前往莫斯科参加追悼斯大林大会	70
七	信任、感激、疑惑 -----	76
八	马共中央代表团驻北京办事处 -----	86
九	中、苏联络部建议我党转变斗争形式 -----	95
十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 -----	103
十一	到公安学院学习，参加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 -----	109
十二	参加苏共“二十大”、“二十大非常会议” 及中共“八大” -----	115

十三 积极开辟回国路线	120
十四 踏上回国的征途	124
越共情深 顺利过境	125
老挝路途艰辛 病重昏厥	135
泰共护送任务 要求万无一失	138
十五 回到党中央根据地	143
十六 接任领导中央北马局	146
十七 加强党军骨干力量	154
十八 重振军威第一仗	157
十九 坚决贯彻新方针	166
二十 中央北马局总部战略转移	171
廿一 开办党校，重整旗鼓	193
廿二 排解民运障碍，成立群众组织	199
廿三 新方针指引下开创的新局面	205
 注 释	212
附件一：《紧急状态条例》的基本内容	218
附件二：关于《林文（小章）同志给王稼祥的报告》	219
附件三：《我们党在抗英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摘录	225
附件四：《中央北马局关于北马工作的初步决定》摘录	227
附件五：《1961年至1963年边区政策和工作总结报告》—— 中央北马局向中央政治局报告	232
附件六：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238
更 正	242

第一章

出国的历程

1948年11月底，党中央派我出国，前往中国北京医治肺病，并同时肩负马共中央代表与中共党联络之重任。妻子林观英随我一同前往。

同年12月抵达香港。

1949年初，根据出发前党委书记陈平同志亲自交代的他与中共联络人连贯【注1】等人约定好的联络地址、暗号及介绍信等，我去到九龙弥敦道找乔木（即乔冠华）。

出于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保密需要，虽在不熟识的异地找路，我也不曾随便问人，只是凭着自己的见识和认知去寻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按照我早已记入脑海中的门牌号，在一条巷中找到了约定的地点。我稳步上到二楼敲门，屋内人走到门内一个鸽子洞似的窗口，打开后隔着门问道：“谁呀？”

我听出是一个妇人的声音，也对着那小窗口，用联络暗语答：“我要找今叔（乔的化名）。”

“这里没有这个人。”不容多问窗口又关上了。

我当然不泄气了。几天后，又去到也是早已约定好的另一

个地点——《华商报》报社，想通过在那工作的连贯找到乔木。不巧，当时连贯不在报社，我就用同样的暗号问：“今叔在吗？”《华商报》负责人的答复很干脆，答案仍旧是“这里无此人！”【注2】

无奈，我只好又回到我租住的深水步张甲二楼，再想办法。

由于身处他乡异地，在白色恐怖笼罩、宪兵特务随时出没的情况下，人生地不熟的，不可轻举妄动。之后几个月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又尝试了几次接头，但仍无法联系上。一直等到同年5月，都没有消息，也联络不上有关方面的人，最后我只好决定，直接去北京找中共的关系。



妻子林观英当年担任交通员，回马的护照像。

我安排好妻子继续留在香港担任交通员的工作，准备随时传递我与中央的信件，并负责联络一些出境的同志，如我党重要干部，原第一独立中队党代表、雪州干部萧林等同志。1950年3月初，我在北京与中共中央联络上之后，便立即派她回国，传达我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共中央有关抗美援朝的决定。这时她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同年10月，完成任务后她才再次上京，与我重逢。

1949年5月，我和早先被英帝驱逐出境的我党同志陈忠秋、黄金木等【注3】一起从香港乘搭“湖北号”轮船，经南朝鲜前往北京。

经过三个昼夜的行程，轮船到达了南朝鲜仁川，但所有乘客一律不准上岸。轮船在“仁川”码头停泊了一昼夜，我们也在船上“百无聊赖”地呆了一天一夜。

在炎炎的烈日之下，我们目睹到的是一群骨瘦如柴又尽显疲惫的码头工人，他们赤膊挥汗地忙碌着起落船货。船上的乘客难耐仓内的闷热，纷纷三五成群地到甲板上散步闲聊。那些搬运工人在午间和工间休息时，不时会脱光衣服，赤裸裸地跳进海里洗澡，对船上的乘客视若无睹，予人不甚礼貌的感觉，船上的女乘客们见此纷纷“迴避三舍”。此时此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南朝鲜码头工人既穷困艰辛，又缺乏文明。

第二天清晨，轮船再启航，继续朝着中国山东方向前进。下半夜，轮船驶进山东沿海，到达大沽口。中国海关人员随即上船检查，办理入关手续，然后便引航沿着黄海大沽河驶向天津。

晌午时分，轮船终于平稳地驶进了天津码头，进行入关检查。检查手续非常严格，直至傍晚，天津海关才将证件发还给乘客，批准上岸。

上岸后，我们便住进一家客栈。不多时，客栈附近因电线走火发生一场小火灾，当地解放军闻讯后马上实行戒严，禁止客栈内的房客外出，听说是为严防反革命份子乘机捣乱。

次日清晨，我们三人便乘火车，踏上直通北京的路程。

那时，由天津到北京也可算是“长途旅行”了，我们在火车上足足坐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北京。

第二章

“青训班”找上门

一出火车站，我们立即雇了一辆三轮车，直到一家简陋的客栈下榻。办妥了住宿手续后，陈忠秋，黄金木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前京畿道的“青训班”，找叶飞、何伟、梁洪亮、否定等【注4】，并将我已来北京、要与中共取得联系等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协助。

叶飞、何伟、梁洪亮等获悉我到北京后，非常高兴，立即来到我们下榻的客栈见我。他乡遇知己，见面的一瞬间，大家兴奋得很。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我表示想通过他们，托“青训班”的负责人【注5】，向中共有关方面转达，关于马共负责人（阿海）来京找关系一事。

三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获悉并确认马共负责人（阿海）来找关系一事，便委派统战部“三室”科级干部田夫同志，来向我了解情况。

又过了两天，在田夫的安排下，我从原下榻的客栈搬进了永安饭店。该处当时为中共用来接待著名民主人士的处所，规格稍低于北京饭店。而陈忠秋和黄金木便到“青训班”学习去了。

据了解，当时在永安饭店里住的还有被英帝驱逐到中国的“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负责人，原雪州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后为中国马来亚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胡一声，和曾与著名作家郭大力一起翻译《资本论》的，大名鼎鼎的王亚南，及小有名气的哲学家马特等大批民主人士。

不久，前新加坡总工会主席，全马总工会秘书长（即总书记）卢成、原全马总工会委员，森州总工会秘书长（或称总书记——记不清了）兼英文、日文翻译员叶焱秀（化名叶春），及原马来亚新民主报总主编陈如旧等，也得知我来到中国北京，并通过有关联系来永安饭店和我座谈。【注6】

他们告诉我，目前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卢成、陈如旧到“马列学院”学习，叶春在“总工会”当英文翻译。

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青训班”的梁洪亮、何伟、叶飞、否定、陈康（忠秋弟弟）、亚珠（女，林亚亮的遗孀）等经常来我处与我谈天。

与此同时，很快的也引起了同住一处的胡一声、原南侨日报编辑胡守愚及黄适安等人对我的注意，甚至无请自到，很有兴致地亲自“登门拜访”。【注7】

一天，胡一声、胡守愚、黄适安三人很客气地来到我的房间，我也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谈话间，他们一直想试探和确认我是否是马共的重要人物及来中国的目的——是否在找中共的联络关系，并向我打听和询问了一些过去他们熟识的朋友和熟人，但出于遵守纪律和地下党保密原则的缘故，很多问题我都没能如实地答复他们。

胡一声：“陈水同志（我到北京后化名‘陈水’，后改为‘陈瑞’。解放后的北京，不论解放军或三轮车夫，一概称呼‘同志’），你认识我的学生阿斯、阿芳或阿谷、阿原、赵佛祥，还有萧兆南他们吗？”【注8】

“哈哈，你认识这么多人呀！不过可能因为他们后来都化了名，或更了名改了姓，所以你这些学生的名字我都不认识，对不起。”我故意不正面回复他。

胡一声：“真的不认识吗？那你为什么认识陈如旧、卢成、叶春，及‘青训班’的马共分子？”

啊，问得好坦率！我听了后，笑了笑，仍没正面回答，只是敷衍地说：“见面就认识了。”

胡守愚：“陈水同志，我想问你，你认识陈平吗？”

由于当时他只是怀疑而并不确定我就是马共中央的干部，所以我也就搪塞说：“不认识”，并反问他：“你认识吗？”

“认识，……”胡守愚一边应着一边用不信我的目光望着我。

黄适安说得更直率：“陈水同志，我在怡保的‘合丰书店’见过你。”

“嗯，是吗？会不会是你认错人啦？”其实我是确定黄适安没有认错人的。记得当时我从金保埠到怡保医院治疗肺病——气胸，到合丰休息时，曾几次在那里听过他大吹大擂说是经营自制的“万金油”生意。但他们的到访是我们的第一次正式

见面，所以很多问题我都只是作些模棱两可的回应。

不过从此，这些“机敏的”民主人士的心目中也确认了我是马共的领导人，而且很乐意、也经常会来找我聊天。

“七·一”前夜——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发表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共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这篇文章。

胡一声，王亚南，马特等民主人士也聚在一起学习讨论。一天，胡一声来到我的住房，很客气地对我说，他们要开一个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座谈会，想邀我一起参加，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邀请，就去参加了。

座谈会由胡一声主持。他用一口“半咸半淡的普通话”（客家话与普通话参半）说：“毛主席的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其中提到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两项主要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同志们对这两件大事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请大家发表意见。”

一个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到北京的羊毛专家首先提问说：“为什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我家里雇了一个工人做家务，他是文盲，

我是知识分子，他怎么能够领导我呢？”

他的提问没有得到即时的响应，大家似乎都在考虑着各自的问题。于是胡一声把眼光转向我说：“陈水同志是工人出身（我在永安饭店时应付外人的身分是柴油机工人，要去东北工厂工作），就请他来解答吧。”

我笑笑说：“大家讲，大家讲，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王亚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人出身的同志应该体会最深。陈水同志，你是工人出身，还是你先讲吧。”

马特：“就是，我同意王亚南同志的意见，陈水同志你就不要推了，你先讲吧。”

“好吧！”我见大家的态度都很诚恳，就说：“既然各位老师都要我这个小学生先讲，那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来讲几句了。讲得不对，请各位老师指正。”

“为什么在革命中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呢？这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即：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政治觉悟，最有组织纪律性，最有远见，最勇敢，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这些特点，其它阶级是没有或缺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

话音刚落，胡一声便转向提问者说：“‘羊毛专家’同志，明白了吗？”

羊毛专家：“听来似乎挺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大明白。”

当时人们的思想都比较简单，讲话也都非常爽直。王亚南听他说还不明白就说：“那你就再努力多学习些革命理论吧！”

胡一声又请其它人继续热烈发言。

一般来说，在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都比较率直简单，而投身和经历过革命的人的发言则较有说服力。王亚南也许是参加革命较早，对革命理论的理解也比较深刻，他对《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表达的较充份，大家听了都更加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马特则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说明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作为领导的必然性。

过了几天，胡一声先生又来到我房间找我聊天，他抱怨我不信任他，说：“我早已是党的同情者历数十年始终如一。在加影教书时已协助过不少学生参加马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而且亲自培育过不少的好学生都加入了马共组织。”

我听后觉得他襟怀很坦白，也知道他指的是那天他询问我关于是否认识他的许多学生的事情，便笑笑说：“胡先生，你是早期的马来亚革命的同情者，我了解你，也相信你；作为在加影华侨学校的先生——你培育出的许多好学生都参加了马共，我们也没有忘记，党是感谢你的！但你也懂得共产党组织有铁的纪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松懈，希望你能理解。中国革命胜利了，马来亚革命还在艰苦地进行中，我们还要加倍努力！”

胡一声听了后渐渐舒展了眉头，来时不快的愁容也变成笑脸了。误会消除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融洽随和了，他不再叫我的名字，而是亲昵地改称我“工头”！

第三章

进住中南海

同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处人事组负责干部龚陶怡同志（黄薇同志的丈夫）来我处通知我，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接我进住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他说：“因考虑到：一、方便你（代表马共中央）同中共中央的联络更加密切，可随时来往；二、你的（肺）病直接由中央保健大夫沈谦（即沈钧儒的儿子，从德国留学毕业回国服务的大医生）负责医疗；三、待健康许可后，依你的意愿可参加中共中央开办的‘第一学习组’学习等几点因素，我们决定接你进中南海。”

对此我表示完全接受他们的决定。我说：“这次中央派我出国医病，并兼任党中央代表与中共中央联络，现在你们安排的这么周到，给我这么优越的医疗条件，又提供机会让我在执行党交给的任务的同时进行学习，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好的学习机会。”实际上，我经历了千辛万难与中共取得联系，最主要是要求中共援助我们的武装斗争。之后，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按照党的政策，我也越来越感到我们应该开展必要的国际活动，进一步暴露英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殖民战争，争取国际支持。

进住中南海后，我被安排住在怀仁堂后院。院内是清朝时代的建筑物，红色大柱子，红色门窗。龚陶怡带我住进这个院